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二辑)

总主编/李玉明

山西国民师范史话

李
洁
/ 著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从1919年招生，到1936年红军东渡后停办，在其前后经历的十七年时间里，不仅培养了大量师德高尚的小学教师，也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一大批革命精英。如薄一波、徐向前、李雪峰、程子华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重要的革命活动基地之一，也是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发源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 编:刘冬梅

韩 慄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2辑)

山西国民师范史话

李 洁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625 字数:300千字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37-1

G·1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国民师范的沿革

..... (1)

二、国民师范的革命活动

..... (9)

三、国民师范与山西特殊形式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25)

四、从国师走出的著名革命精英

..... (39)

结束语 (44)

主 编 郭维明
副主编 张国祥

引 子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从1919年招收第一期学生，到1936年红军东渡后停办，前后共经历了十七年的时间。在这过程中，它不仅培养了大量师德高尚的小学教师，也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一大批革命精英。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重要的革命活动基地之一，也是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溯源地；并由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国民师范的沿革

（一）创办宗旨和初建规模

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搞国民、军国主义教育从小学教育入手颇为欣赏。1917年7月阎锡山任督军，并暂任山西省长，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一度着眼于教育建设。他大力推行军国主义式的“国民政治”，实行所谓“民智”就必须兴办“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和“社会教育”，尤以“国民教育”为首，遂着手在山西境内建立了一套仿照日本小学教育模式以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体系，并于1918年公布了《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阎锡山大力推行这些教育，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一批能为其所用的人才，以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因此，当年

阎锡山以“广造师资”为名，在省城小北门内开办国民师范学校，并委派专员负责营建。

当年，国师招了26个班（共1500人），所以，它从建校到1924年间，兴建规模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校址总面积24万平方米，校舍890余间，由学校校本部（93800平方米）、体育场（53366平方米）和农场（90576平方米）三部分组成。校本部有教室43座，办公楼1座，东西图书馆各1座，大礼堂1座，理化实验室3座，教员办公室93间，学生自习室和东西各十斋的学生宿舍20排，还有器械室、储藏室、校警室、传达室、夫役室等31间，饮食、卫生、医务等室160多间，路西是体育场、校园，国师里（即教职员工宿舍）。整个校园规模完整，校舍宽敞，设施齐全，在山西都是属于第一流的，为日后学生从事各种活动提供了场所。

（二）管理体制

校长及师资：从学校开办到1936年停办，先后有6位著名人士担任校长职务，分别为赵戴文、郭象升、赵丕廉、乔万达、冯司直、赵效杰。他们均为阎锡山的党徒，秉承阎的旨意来教育学生；但从另一角度看，他们大多都是学者、教育家，在教育上是精通的，尤在师范教育方面，对传播科学知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赵丕廉任校长时，他对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使学校由普通师范改为五年制师范；校长下设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各班设主任1人；他对教育事业极具热忱；学识上很受人钦佩，并且对学生的社团活动很重视，以至

拨款支持。进步学生则以社团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传播马列主义。如果学生触犯了官府的规定，而被处罚、通缉，他多予以包容庇护，努力挽救。因此，在客观上给学生创造了一种较为民主的氛围。为中共党团组织在国师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在师资方面，据资料记载，国师的教员大多毕业于国内一流师范学校、大学及各专科学校，有的还是留英、美、德、日学生，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都较高。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大多有政治改革的愿望，有的提倡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有受十月革命影响信奉马列主义的，如第一任教务主任马鸣鸾（鹤天）是李大钊的挚友，受李大钊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并极力予以宣传。同时，在教师队伍中，有一批进步的教职员，如邢西萍（徐冰，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一林、宋振寰（宋日昌，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家建工部部长）、田满义、杜心源（曾任四川省人大主任）、李和林、郝德青（曾任外交学会会长）、吕义山（原任二炮政委）等人。他们利用课堂宣传进步思想，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后又进行大量的革命宣传活动，使广大师生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学生来源及待遇：据资料表明，国师成立时，60%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及贫寒家庭，如徐向前、程子华都是穷苦家中的孩子，这种现象的发生，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校待遇较为优厚——不收学费，制服、膳宿、讲义等费用由学校供给，课本由学校补助半价，用具等项由学校

补助三分之一。此外，学校和兵营一样，学生每年发一套军服，一套单衣，还有兵鞋，这样，学生生活有了保障。二是就业容易，当时文化人，尤其小学教员在全省需求量很大，而富家子弟不愿干这一行，故许多贫苦人家子弟报考到国师。所以，当时社会曾流传这样的说法：“国民师范招生，拉洋车子的少了一半。”

正是由于这些学生处于这样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学习刻苦，勤奋，在政治上有阶级基础，能够很容易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尤其在学校开办期间，整个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军阀混战的年代，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民族的苦难和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推动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在学校地下党的组织下，不少同学思想进步，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去。

对学生的管理：开办之初，学校实行军队编制，采用队长制，每两班委派队长1人，第二学期改队长名称为训育员，1921年7月又改训育员为班主任制，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规则，如：录事办公室规则、教室规则、宿舍规则、器械规则等。并对学生上课、缺课、请假等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尤其在政治上，采用军阀独裁统治，学生受到严格的控制，没有集社结会和成立学生会的自由，完全实施的是准军事化制度。学生们强烈反对这种制度，遂有了“打倒徐一鉴，成立学生会”之学潮，结果轰走了徐一鉴及合谋压制学生的反动教员，以学监制代替班主任制而取得胜利。

东、西图书馆：东、西图书馆各面宽六间（20米），进

深三间（10米），面积为200平方米，单层房后又加上一栋二层藏书楼。整个图书馆有完善的图书馆简章及阅览规则等，东图书馆是国师的藏书室，珍藏着一些古善本；西图书馆是阅览室，藏有大量的进步书刊，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卡尔·马克思》及《社会主义与战争》《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一个青年的梦》等。由于它是国师又一个革命活动的地方，因而进步学生的一些秘密聚会也在此进行。1937年刘少奇同志曾在这里，为牺盟会干部和军政训练班学员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三）教学制度

编制：学校从1919年8月开始招生，当时阎锡山令全省105个县各选学生10人，共1260人，编为二年制普通班1—20班；又由省教育厅派人赴天津、保定招取中学毕业生291人，设二部师范，11月又招中专毕业生73人，开设高等体育专修科。开办之初，共有学生26个班，1500多学生，教职员79人，为当时山西最大的学校。可阎锡山万万没想到，这所学校竟成了共产党在太原的活动中心，培养了一批为推翻他的统治而奋斗不息的革命人才。

学制及专业设置：在最初五年内，学制屡经变更，比较混杂，二、三种学制同时并存，分为一、二、五年制；专业设置有普通科师范（二年制），二部师范制（一年制）及高等体育专修科（二年制），完全科师范五年制，职业养成科（二年制），初习科、初级雅乐专修科（一年制），职工养成科（二年制）。1923年后，学制逐渐趋于固定，当年招

收的学生按新学制编为六年制师范班，分前后两期各三年（前期相当于初中，后期相当于高中）。同时，又设高级雅乐专修科（一年制）。1925年，开办高等师范部，仅国文一个系，招生一个班（1929年，高等师范部改为独立学校，定名为山西省立教育学院）。1931年，遵照部章改为高中师范科并附设初中，1933年奉教育厅令停办初中。

课程设置与成绩考核：1925年后，课程设置按教育部规定办理，有公民科、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科、教育概论、珠算、手工、乐歌、图画及正规的军事课程（如《步兵操典》《军事典范论》《内和条令》等，每周有两次军事课，每学期一次野外演习，还要打靶）、体育、实用工艺共15门。各科修业均采用学分制，以每周授课1时，满一学期为1学分，无需课外预备之科目则分为半分，每学期以26学分为准，但可依学习成绩加减3学分。同时，规定前期（3年）各科为必修课，后期于第五学年开展采用分组选修，共有文、史、地、自然科和艺术3组供学生自由选择，但至少选修20学分。最终以修满347分为合格，准予毕业（前期191分；后期156分）。

（四）职业技术教育

由于学校的教学体制是“半工半读，以工养学，”并注重对学生实用工艺的教育，故开设工场，“养成其勤朴而劳的习惯，并使其知各种工人之甘苦，悉各样工艺之手术；”开设农场，“以养成学生农业上相当技能，俾知稼穡艰难，促成勤劳习惯。”

学校建立一年后，即开始举办职业师资班。分金工、木

工各一班，学制定为二年。次年，鉴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日益迫切，于是改组校务，兼培养职业教员，在校内兴建杂工厂两座（主要制造肥皂、粉笔、蜡烛，并有缝纫、生产鞋、毛笔等），木工厂（生产桌椅、书架、儿童玩具等），织工厂各一座（生产布匹、毛巾、毛线、手套、地毯等），同年10月即逐次开工实习。1921年，又购得东门外地136亩，作为学生实习农场。1922年又增添纽扣工厂、毛织厂各1座，添织机器120台左右。该校所办工厂规模之庞大，设备之齐全，产品种类之多，在太原市学校中首屈一指。1923年又采用新学制，将实习工艺列为15门科目之一，要求学生通过在工厂中的学习和实践，熟练掌握一种生产技能，学成后即可学习另一种生产技术，并规定各班学生分别定时定点轮流到农场（每个班有15亩地，自种自收、收入归己）、工场（每个学生每周要有五次到工厂做工，每次2个小时）勤工俭学，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及学生自立自强自尊自治的能力，吃苦耐劳及进取牺牲的服务精神。另外，学校还有一套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举措，即在课余时间开设有储金兑换所、国货公卖室、文具公卖室等，由学生轮流管理，盈余按比例分配，以“养成学生节俭之习惯。”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创举，学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据学校校刊报道：1922年、1923年两年中，从附设的五所工厂学得生产技能的学生总数达636人，工厂在1921年至1923年中盈利总额为6565.384元（大洋）。正因国师的职业教育办得比较出色，所以1933年，在大力提倡职业教育的形势下，教育部令该校改组为职业学校。

（五）校训

国师的校训是“公道爱群”。阎锡山的本意是用“唯中论”、“存在论”，宣传他的“公平制度”和“村本政治”等，而学校的共产党员则以无产阶级的功利观，借用阎锡山的口号和做法，宣传无产阶级的公道，反对剥削，与工农相结合，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学生中反响极大。

（六）附属小学

国民师范原有附属小学两处，共计高级8个班，初级23个班，幼稚2个班，是省城规模最大的小学。一处是民国九年（1920）收回的阳曲县立第一国民小学，设在新民西街，名“国民师范附属小学”，办有高级8个班，初级14个班，幼稚2个班。另一处设于小北门街，名“国民师范附属初级小学”，办有初级9个班。两校各设立主任1人，主持其事。国师改组后，两处小学分别获准独办，归山西省教育厅直辖。为纪念国民师范，将新民西街改为国师街，此处附小称为“山西省立国师小学”。又因小北门街名太长，便在小北门上置“拱极门”匾额，称该处小学为“山西省立太原拱极小学校”。

（七）改组与停办

1933年，教育部派员视察山西教育状况后，于十二月即以“山西师范学校过多而职业学校仍不敷需要”为由，准备将国民师范于1934年改办为“职业学校”。加之反会考斗争之后，国师已经成为一团扑不灭的革命烈火，违背了阎锡山办校初衷，于是他决定从当年下半年起，国师不再招生。1935年4月，先行开设电器装置及修理一班，仅学科

一班，仍附设于国民师范，称国民师范附属职班。1936年暑假，国师原有师范班学生完全毕业。同时，国师实际上已成为省、市中共党组织的核心所在，成为学生革命活动的大本营。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恼怒，遂于1936年正式下令停办。

二、国民师范的革命活动

（一）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树起了一道界碑。尽管阎锡山对学生严加控制，但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怎么也挡不住学生接触新文化、接受新思想的潮流。国师学生同各地的学生一样，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冲破了阎锡山倡导的尊孔复古的封建文化，马列主义思想便以太原省立一中为中心迅速传播开来。国师中的先进分子亦大量涌现出来，在1924年春，就有梁其昌、韦思恭、纪秀川等进步学生首先秘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建立了国师团支部，梁其昌为书记，并创办了党、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学社”，旨在发展团组织和进行革命宣传。学社内存有《向导》周报，瞿秋白编写的《社会科学讲义》以及《政治生活》、《中国日报》等进步书报杂志，供进步学生阅读。早期成员有程世杰（程子华）、王世英、纪秀川、武学

和、燕廷标、周子桢、阎兴业、聂鑫元等，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们相继加入了团组织。在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术研究会”、“青年墙报社”（负责人常苏民、郝庭思）、“国语辩论会”、“音乐研究会”和“体育研究会”、“英文学会”等10余个学术团体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学术团体既从公开渠道向学校领取部分活动经费，进行会员间的学习交流活动，又可以在社会名义掩护下，印刷党团的秘密刊物和传单，联系进步同学，发展党员和团员，成为国师进行革命宣传的阵地和联系群众的纽带。

1925年12月，国师又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由薄书存（薄一波）担任国师的党支部书记，1926年夏，中共太原地委以东西羊市大街为界，设立了南部委和北部委，北部委驻在国师，薄一波担任副书记并主持工作，北部委是在太原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它除了主管国师、平民中学、成成中学、新民中学、山西大学等学校党的工作外，更重要的还主管育才机器厂、枪械公务处等兵工厂党的工作。并且，团地委机关也在国师办公，这样，国师就成了中共太原地委领导的又一个重要的革命活动阵地。

国师党支部成立后，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从1926年初到1927年初，山西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1925年10月，全省总共才有30名党员，到1927年初，仅国师就有30名党员，近200名团员。其次是结合时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以党员为骨干，领导国师学生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国师学潮：阎锡山掌管山西军政大权后，便处心积虑

地为巩固其反动统治扩充军队筹划军饷，甚至巧立名目决定向全省人民征收房税2 000万元。针对阎锡山的横征暴敛，太原党组织决定依靠党团员在学生中的影响，通过省学联，联合各种反阎力量，于1925年5月28日开展了反对当局征收房税的革命群众运动，并迫使阎锡山当着学生的面写下了“房税即日取消，已收者全部退回”的手谕。

而当时革命基础较好的省立国民师范因受校方掣肘，未能参加此次斗争，激起国师学生极大愤慨。时任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的傅懋恭（彭真）指出：“国师未能参加反房税运动，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组织起来……现在由于反房税斗争胜利的鼓舞，国师同学的斗志更大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同学组织起来，采取行动，争取打倒总干事，成立学生会。”于是，国师团支部负责人纪秀川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开展了继1924年在校团支部发动的罢课风潮之后的又一次国师学潮。

当天晚上自习时，从东排第一学舍开始，传进来一张条子，一直传到西排各学舍，让各班出一个代表到十四教室开会。聂鸿懋是首先发出条子召集会议的人。梁其昌、纪秀川等青年团员也早在团内作了动员，要对没有参加反房税斗争作出反应。十四教室开会时，聂鸿懋大发议论说，这样大的事我们没能参加，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很丢脸。不给腐败保守的国师教员一点颜色看，我就不甘心！纪秀川在会上说：“不是学联没发通知，是总干事徐一鉴扣下了。”（这是一句很有鼓动性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谁也不清楚。）大家都非常气愤，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表了态，议定

要驱逐徐一鉴和不称职的班主任及某些反动教职员，晚自习后就行动。

下自习后，同学们刚刚回到宿舍里，就有人在各宿舍前大声喊：“集合！集合！到大楼前集合！”不一会儿，大楼前就集中了大约1000多人。同学们听说是校方阻拦学生参加反房税斗争，又传说徐一鉴把给学校盖大楼的公款，给自己在“国师里”（巷名）盖了公馆，便群情激愤，立即分头行动起来。

薄一波，领着一群同学直奔国师里徐一鉴家，谁知有人通风报信，他已经跑了，家里只留了一个耳聋眼花的老太太。在校班主任和教职员们见学生闹事，也大都仓惶离去。

临时性的学生自治会由各班派代表参加，很快成立起来了，并议定了两条：一是明天（5月19日）照常上课，由临时学生自治会维持秩序，不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攻击学生的把柄；二是派代表去向校长赵戴文请愿。

他们向赵戴文提了三条要求：一、撤换总干事徐一鉴和欺压学生的班主任及某些不称职的教职员；二、允许成立学生会；三、今后不得随便开除学生。这三条赵戴文都同意了。

第二天，赵戴文和赵丕廉一起来到学校，接见了学生代表。赵戴文说：“徐一鉴和教务主任、庶务主任可以免职，班主任不能废除，不称职的可以免职。学校设总学监一人，班主任也归总学监领导。我现在宣布辞去校长职务，由赵丕廉先生任新校长。”

“5·18”反房税斗争后，国师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的思想空前的活跃起来。学生会成立了，并加入了省学联。从此，国师学生挣脱了旧校规的束缚，争得了一定的自由，改变了以往沉闷落后的状态，使党团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共产党在太原继省立一中之后，开展革命活动的又一个中心。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经过南京路时，英国巡捕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10人，逮捕5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市民听到此消息后，即义愤填膺，纷纷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五卅”反帝斗争。太原学生在山西学联的组织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和罢课、募捐等活动。国师学生成为这次运动的主力军。当时，薄一波起草了一份传单，号召同学们和市民声援上海工人，这份传单在校内、校外广为散发，影响不小。并选出学生代表100余人，组织了“沪案后援会”，积极参加了全市反英、反日游行示威，又组织了200多人的话剧和400多人的讲演队走上大街小巷，进行反帝爱国宣传。6月6日，全校同学参加了省学联组织的中等以上学校的罢课，在文瀛湖（又称海子边）集会，声讨英帝国主义的罪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发动省城各行各业开会，捐款和抵制英、日货等活动。学生们带头捐款捐物，有的把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卖掉，有的把做临时工赚到的钱全部捐出，并且将新剧团